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編

浙江八年抗戰

上冊：回忆录

浙逆錢
江以漢
岳湖杭

革命向來志

周立夫



编 审 杨福茂 高三山
主 编 朱 健
编 辑 王彬彬 邓金松

上册前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处于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为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同时对准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驻杭州的中国空军奋勇反击,“八·一四”杭州空战,首开中国空军击落敌机的先例,这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对浙江本土军事侵略的开始。11月,日军在杭州湾北岸强攻登陆。至年底,包括省会杭州在内的浙西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

浙江的抗战,是在国共两党浙江地方当局较早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展开的。1937年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战发在即的形势下,以刘英、粟裕为首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就主动呼吁国民党浙江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经过几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10月,坚持在闽浙边一带的红军在平阳会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中共组织接着在平阳积极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以培养和加强抗战力量。193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抗日游击总队主力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浙南,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继续坚持工作。期间,中共在浙江各地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至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省先后建立了6个中共特委和50多个县级中共组织,共产党员达到2万多人。

这一时期，浙江中共组织在推动以黄绍竑为首的浙江国民党军政当局坚持抗日救国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再度出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顺应当时抗日救国的进步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进步的政策。如在中共党员的影响和推动下，主持制定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全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建立，是他“刷新战时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成为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与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主要组织形式。同时，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爱国团体纷纷云集金华、丽水等地，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浙江的抗战文化事业曾一度被誉为是“东南重要的一环”。1939年3月，周恩来视察浙江，极大地鼓舞了浙江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浙江的抗战，是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下进行的。抗战初期，当杭州沦陷后，虽然敌我基本形成钱塘江对峙的局面，但浙江军民的武装抗日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在“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口号鼓舞下，不断深入浙西敌后开展游击斗争。除国民党正规部队主动渡江偷袭敌人外，在杭、嘉、湖的广大农村，还有70多支民众武装自发组织起来抗日。1940年1月，日军渡江占领萧山后，敌我对峙的形势被打破。此后，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过数次大的战役，如1940年7月的镇海反击战；1941年4月的宁绍战役等。而1942年5月开始的浙赣战役，则是抗战中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重要会战。这场战役持续了3个月，给予日军以重大的杀伤和消耗，击毙了日军师团长酒井直次郎中将，但中国军队在金兰、衢州等保卫战中失利，使敌人最终达到了破坏衢州、丽水、玉山机场，及长期占领武义等地萤石矿资源的目的。这是浙江军民为整个太平洋战争所作出的一次巨大牺牲。

根据浙江抗战的发展形势，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展东南沿海游击战争的决定。由浙东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中

共浦东工委派遣南渡杭州湾的武装力量共同努力,在三北(镇海、慈溪、余姚3县以北)地区站稳了脚跟。1941年7月间,他们与中共中央派来的由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的武装汇合,组建了中共浙东区委。浙东武装努力贯彻“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1943年底,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期间进行了3次大的反顽自卫战争,形成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是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在浙南,1942年刘英遇难,省委被破坏后,各特委开始独立坚持斗争。1945年初,中共浙南特委先后领导了乐清虹桥起义和永嘉的屿北起义,发展了以北雁荡山为活动中心的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在浙西,为配合盟军登陆,1945年1月,新四军一师主力在粟裕率领下,从苏中进入浙西,建立了苏浙军区。在短短5个月中,经过3次浙西反顽自卫战争,在临安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开辟了以长兴为中心的浙西抗日根据地。当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浙东游击纵队和苏浙军区分别向所在区域日伪军发起大反攻,先后收复了大片国土,抗战胜利后,浙东、浙西的中共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赴苏北解放区,胜利地完成了北撤任务。

浙江是“这次战争中的重灾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包括省会杭州在内,共有77个市县,其中只有9个县城未被日本陆军践踏过;战争中日军飞机空袭多达1000多次,投弹1.7万余枚,仅有4个县未遭日机空袭。被杀害的中国百姓和被毁的民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军还在浙江的衢县、宁波、金华等地进行灭绝人性的人体细菌实验和细菌战,无数同胞惨遭毒害……

浙江的8年抗战,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一样,充满着牺牲与悲壮,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中共浙江地方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还是浙江省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爱国举措和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官兵对日军的顽强抵抗,以及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歌

目 录

上册前言.....	(1)
-----------	-----

(一)

抗战初期在浙南.....	束 裕(1)
闽北、南昌之行	余龙贵(5)
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黄先河(9)
回忆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	黄耕夫(13)
一九三八年在浙江	张爱萍(18)
战时僧尼救护队	释木鱼(23)
回忆金华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	骆耕漠(26)
在战火中主浙八年	黄绍斌(33)
战时浙江回忆	严北溟(44)
战时在浙江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点滴回忆	孙晓村(55)
一九三九年浙江党内的一件大事	龙 跃(59)
从冠尖山到宝塔山	林一心 刘先 谢廷斋(65)
汉奸市长何瓚被诛记	沈国英(76)

(二)

“八·一四”空战的回忆	唐中和(81)
天目山告岭之战	凌压西(85)

回忆在浙西的抗战	朱 希(89)
暂编第三十四师一团在镇海抗战纪实	章文朗(93)
临安军民护送美国飞行员	朱学三(100)
日军师团长毙命兰溪	韩正礼(105)
衢州保卫战亲历记	陈頔鼎(113)
押解日军战俘和杭州受降见闻	程振坤(122)
我参加宋殿受降	(台湾)周乐军(127)

(三)

从浦东到浙东	顾德欢 吕炳奎(130)
浙东四年回忆	谭启龙(139)
杨嘉猷痛击日寇	张季伦(164)
关于定海五大的回忆	陈子方(168)
抗战八年 战斗在浙江	彭林 孙秉夫 张志莹(176)
血战大鱼山岛	张大鹏 何亦达(198)
围攻许岙	张文碧(207)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外事三则	顾春林(216)
忆吴山民	桂承钧(231)
国际主义战士坂本贤阶	江征帆(240)
澈浦战斗	何克希(250)
把中央指示带回来	郑嘉顺(254)
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击总队	周丕振(261)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栗 裕(270)
天目山反顽	叶 飞(304)
回忆在浙西	金 明(315)

浙西特委回忆.....	顾玉良(318)
与日本人山本的几次接触.....	郎玉麟(327)

(四)

湖州人民难忘血海深仇.....	温丰之等(329)
日军在余杭乔司的大屠杀.....	张宝福(334)
大蛟的浩劫.....	田 心(337)
三十九天血的经历.....	倪哲生(339)
日军在云和施行细菌战目睹记.....	王存义(341)
日军三次侵占温州的暴行.....	叶汉龙(345)

抗战初期在浙南

粟 裕

1937年9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

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我们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等同志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雷,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等胜利会合。这时,我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年4月,在刘英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3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8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

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1935年初挺进师挺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3个支队和1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3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

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便和曾山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1934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3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1942年春，刘英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5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3月18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3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

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我们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时，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1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3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原载《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93至2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闽北、南昌之行

余龙贵

1937年1月，在泰顺峰门战斗中，我负伤留在冬瓜坪黄明星家里，后被送到福鼎县郑丹甫那里养伤。9月间，张文碧带部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跟张文碧等一起连夜动身，赶到平阳北港山门和刘英会合。那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已经达成协议，分散在平阳、泰顺、福鼎、瑞安、青田等地的部队已开始到山门集中。当时消息闭塞，我们还不知道闽北、赣东北红军的和谈情况。为了尽快地和这些地方红军取得联系，以便相互配合，统一行动，1937年10月间，刘英派陈铁军、苏斗正和我3人，去闽北、赣东北地区找那里的负责人黄道和关英联系。

不久，我们3个人通过组织关系，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搞到一张通行证，穿着便衣，带了些钱和一个装着我们3个人行装的包裹（为减少误会而不带枪），从平阳出发抄小路西行。临行前，刘英口头向我们布置了任务，并亲自送我们上路。

按照刘英的吩咐，我们这次西行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向黄道介绍我们现在的情况。即闽浙边临时省委已和国民党当局和谈，并达成协议；我们的部队虽在敌人的“围剿”中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主要骨干还幸运地保存着，来自各地的200余名武装人员已在平阳山门街集中；临时省委现正在和国民党进一步合作，准备在浙南一带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浙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地方青年的革命要求也很强烈。二是向黄道、关英了解他们是否下山和国民党合作，是否与中央分局取得联系等情况。我们经平阳坑、百丈口，进入景宁、庆元、浦城等县山区，花了20多天时间。

一路上，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故意刁难，我们3人遇到很多麻

烦,甚至生命危险。一天,当我们精疲力尽地来到景宁坑口小溪镇时,遇到了国民党部队的1个排,他们事先已有准备,等我们一到就一拥而上,用刺刀对着我们的胸口进行盘问、搜身,并不由分辩地说我们是“土匪”,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带到镇上,说要处治我们。在镇里又有八九个士兵,用刺刀威逼着,把我们带到排长那里去审问,并要扣留我们。我们申辩说:我们有国民党政府通行证,不是“土匪”,是履行公事的,你们捆我们没关系,误了事你们必须负责!但他们说通行证是假的。我们反驳说:“难道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也是假的吗?”他们蛮不讲理,还是扣留了我们。在小溪镇住了几天后,敌人找不到借口,只好把我们放了。从小溪镇出来后,还未到庆元县城,又遇上国民党区公所卫兵。这些身穿便衣的卫兵,公然持枪拦路抢劫,抢光了我们的钱和其它东西,而且把我们3人捆绑起来送往区公所。在去区公所的途中,我们又遇到六七个人,故意问:“绑的是什么人?”卫兵说是“土匪”,我们当即反驳说,我们不是“土匪”,是共产党人,有国民党省政府开的通行证,是上级派我们去找红军,集中北上抗日的,现在国共合作,只有汉奸卖国贼才破坏合作,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那几个人看了我们的通行证后,嘀咕了几句,就把我们放了。其实,他们是同伙抢劫,没有归还我们的钱和东西。尔后我们到了庆元县,与县自卫大队队长见了面,陈铁军从他的口音中辨认出他是平阳人,于是双方互认同乡,我们就在他那住了两天,后借钱起程了。经过浦城,进入江西境内,到处打听,最后在铅山县石塘地方找到了黄道。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黄道,当即向他简单介绍了临时省委在浙南一带活动的情况。黄道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原先已听到一些关于你们的消息,但由于事情很多,再加上环境的关系,一直派不出人和你们联系,现在听了你们的介绍,也就放心了。由于当时黄道很忙,我们作短暂交谈后,就相约夜里再详谈。当天夜里,黄道叫来了几个主要干部,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接着他们也向我们介绍了闽北的情况,并要求我们转告刘、粟首长。在黄道那里

住了约一星期后，我们告诉黄道，根据刘英的意思，我们还得到赣东北找关英。黄道说，你们不能去，关英那边拒绝和国民党谈判，说是要为革命斗争到底；还说我们“不革命”，“叛变革命”，“是向国民党投降”。黄道曾两次派人去同他联系，结果都被他误杀了。既然不好去赣东北，我们便动身回平阳了。

在返平阳的路上，我们公开走大道，但仍然遇到许多困难。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致使社会满目疮痍，混乱不堪，交通运输极不正常。当时我们从石塘出发，一直步行到上饶，准备乘火车回金华。但上饶一直无车可乘，只好从上饶再步行到玉山上车。玉山同样没有正常班车经过。若步行回家实在太费时了！怎么办？正当我们着急时，发现玉山站内有一辆机车正准备开往衢州。这时，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家商量一下，决定上车再说。于是我们3人偷偷摸摸上了机车，躲在煤厢里。来到衢州，一下车我们也顾不上吃饭，就四处打听班车情况，但同样无车。结果又回到车站，发现我们所乘的那辆机车，正在挂车，准备运载部队开往金华。于是我们在国民党部队没来前就摸上了车，靠在一个角落装睡。过不久，国民党部队上车后，火车开动了。这时有两个士兵发现了我们，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看他们是士兵的模样，也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两个士兵听说我们是红军，显得非常亲热，他们说，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了。说着他们还掏出东西分给我们吃。这样，我们总算较顺利地来到了金华。

到金华已是子夜，找旅馆又遇到国民党特务的麻烦，他们硬说我们是“汉奸”，把我们带到国民党连部。连部又推到营部，无休止的盘问、搜查，弄得我们一夜未合眼。他们没能捞到什么东西，也就放了我们。在金华，我们搭上了一辆军用汽车来到丽水。在丽水又找不到车辆，只好搭一只小船顺水到温州。我们以为这下该安然无恙了，不料又遇到国民党便衣的检查。这天夜里，我们在旅馆中睡得正香，突然有几个便衣破门而入，把我们3个从被窝里拉了起来，对整个房间进行了搜查。他们发现我们是红军，追问我们为什么

么不到九柏园头的办事处去住，硬说我们是“汉奸”，耀武扬威地要把我们捆起来。大家看到这几个野蛮的便衣又好气又好笑，大声地讽刺他们说，温州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如果真的遇上汉奸，我看你们才认不出来呢！这些便衣听到我们的话说得很硬，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以后，我们比较顺利，回到平阳山门，向刘、粟首长汇报了闽北之行的情况。

1938年2月间，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发展，闽浙边临时省委迫切需要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直接得到中央的指导。为此，刘英派龙跃和我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要求中央派负责同志来平阳直接指导工作。由于此时各方面工作已全部公开，再加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得到过共产党的帮助，在政治上比较进步，使我们这次江西之行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从平阳出发，乘汽车到金华，再由金华乘火车来到南昌。

一到南昌，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项英接见了我们，龙跃把刘英的简信交给项英，然后向他汇报了临时省委在平阳的基本情况。项英听完，赞扬了临时省委的工作，并指定曾山具体负责我们的事情。我们在晚上，向曾山详细汇报了情况。在南昌，我们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有点急了，要求项英抓紧解决我们的问题。项英说，你们的问题我们已经研究了，决定派曾山亲自去你们那边。2月底，我们和曾山3人，登上了开往金华的火车，再转乘汽车到了温州，后又改乘小船经瑞安到平阳，从平阳步行到鳌江。我们3人找到吴毓后，坐木船来到水头，第二天上午步行到达北港山门，在龙井庵和刘、粟首长会面。至此，我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原载《光辉的历程》第110至1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6月版）

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黄 先 河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创办于1938年1月，至3月15日结业，历时2个多月。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为了培养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干部，决定创办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平阳山门群众基础较好，交通也方便，省委又驻在附近的大屯，红军挺进师不久前也在此集中。因此，校址就选定在山门附近山岗上的畴溪小学内。

1937年国共合作后，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永嘉、青田、乐清、玉环、瑞安、平阳等地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纷纷办起了战时青年服务团，他们上街演讲、化装宣传演出、办时事讲座，搞得热火朝天。1938年1月5日，当《浙甌日报》上刊登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后，这些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报名，从开办至结业的2个多月里，来校的青年、学生络绎不绝，每天都有，真是应接不暇，畴溪小学的所有校舍都住满了人。原计划干校只招收100名学员，实际多招收了几十名，最后学员总数为150名左右。其中部分学员是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推荐、介绍来的。他们多数来自浙南各县，部分来自台州和宁波一带，也有少数青年是闻讯从外省远道赶来的。学员中多数原是学生（一般为中学生，少数只读过小学，个别是大学生），也有青年工人，小学教师等。女学员约30人。

抗日干校的校长是粟裕，我是副校长，教导主任黄耕夫，总务主任邓野农，夏野士负责事务工作，林夫负责文字宣传工作。平西